第53卷 第6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3, No.6
2016年11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16

理性化、城市化与城市病

陈友华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南京 210046)

摘　要: 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就是人类理性增长的过程。大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病是所有国家迈入现代化门槛不可逾越的难题,其形成原因复杂,而欲望膨胀、忍耐力下降与"快的代价"是中国城市病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城市化不仅会制造问题而且会解决问题。城市病与农村病存在跷跷板效应,对城市病的治理失当,将加重农村病。移民是城市竞争力与活力所在,刻意回避城市病会导致严重后果,对城市病的不同治理路径折射出人性的光辉与人性的贪婪。

关键词: 理性化;城市化;城市病

中图分类号: C 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6)06-0107-07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教育的普及,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不断加深,决策时所能依据的信息也越多,从而更加科学与理性。由此可见,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本质上是个人理性增长的过程。谁都知道去北京等大城市会面临工作压力大、生活成本高、住房困难等一系列难题,但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地一股脑儿地往北京等大城市钻? 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口的持续膨胀,城市病在中国有愈演愈烈之势,抱怨与纷争及随之而来的对城市病的治理也早已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然而,对城市病的治理不仅越来越牵动着城市、特别是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政府与百姓的神经,而且也牵动着每一位城市外来者的神经。而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实际上也变相承认了中国传统城市化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因而希望探索出一条城市化新路。本文基于理性化视角对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病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审视,希望吸引更多人对此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一、城市化演变规律及其动因

(一)城市化

1. 城市化

城市是各种资源的集聚地与富集地。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在进入工业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由于各种资源聚集本身会产生集聚效应或规模效应,进而推动城市化发展。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化进程呈现出Logistic或S曲线形态,城市化率突破30%后进入加速阶段,到50%左右后转入减速阶段,直到城市化率接近70%时出现停滞。从人口流动看,当城市化率低于50%时,以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为主,而当城市化率超过50%时,以中小城市人口进入大城市为主。

2. 大城市化

城市是资源集聚的产物。可以把资源划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政府资源、市场资源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源相对于政府资源与市场资源而言要少得多,可把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合并称之为公共资源,主要由政府掌控。因此,有两股资源配置的基本力量:政府和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时以效率为准则,其结

收稿日期: 2016-06-20

作者简介: 陈友华,男,江苏如东县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1AZD025)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生育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4JJD840007)的阶段性成果。

果是市场资源的聚集。公共资源配置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差异很大,按照公平与效率取向配置公共资源,可把政府划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社会型政府与市场型政府。西方国家政府多属于社会型政府,而中国则属于典型的市场型政府。社会型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时遵循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指导下的公共资源不仅是分散配置,而且更倾向于向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倾斜,而市场资源与公共资源配置方向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最终还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渐占据上风,其结果是缓慢的大城市化,详见图 1。而市场型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时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其结果是公共资源的聚集,市场资源与公共资源配置的同方向叠加,其结果是快速的大城市化,详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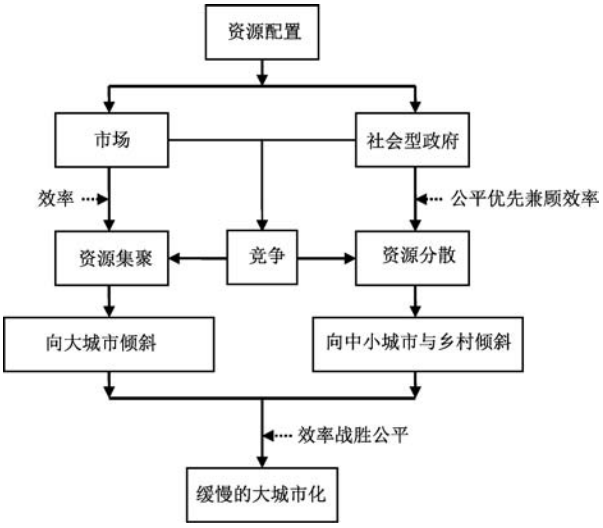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型政府国家的资源配置与城市化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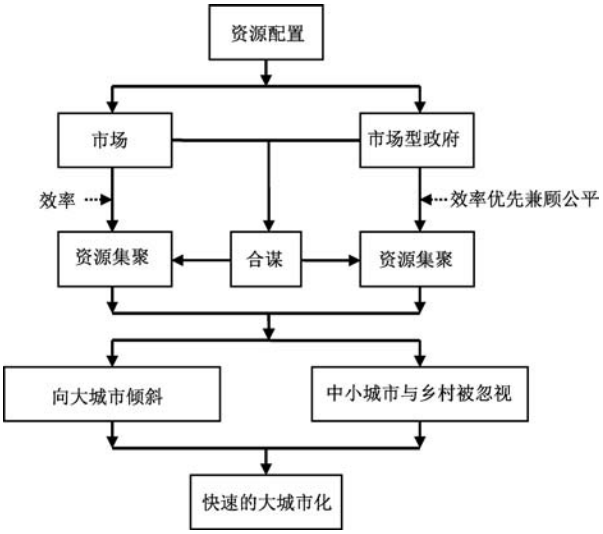

图 2　市场型政府国家的资源配置与城市化道路

3. 中外案例

(1) 人口增长的美国

美国是一个人口持续增长的国家,美国的人口增长主要靠国际移民。美国在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人口正逐渐向沿海与大都市区聚集,而很多中小城市的人口则出现停滞甚至减少,被废弃的城市开始出现。

(2)人口停滞的德国

德国的人口长期自然负增长,靠移民勉强维持总人口的平稳。但德国内部人口向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柏林、汉堡等州聚集,其他州人口减少。人口净增长的各州都是经济发达区域,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的空间流动和集聚有极强的相关性(陆军,2009)。德国是世界上城乡与区域发展最均衡的国家之一,但即便如此,人口也出现了空间上的加速集聚现象。

(3)人口减少的俄罗斯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人口在开始减少的同时,人口也在加速向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等大城市聚集。

表 1　俄罗斯城市人口规模变化(1989 - 2012 年)(单位:个;万人)

年份	>100 万		50—100 万		10—50 万		5—10 万	
	城市	人口	城市	人口	城市	人口	城市	人口
1989	12	2516	22	1404	131	2816	165	1129
1999	13	2464	21	1356	131	2836	174	1197
2012	13	2951	23	1451	129	2700	152	1065

数据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数据。转引自李莎、刘卫东:《俄罗斯人口分布及其空间格局演化》,《经济地理》2014 年第 2 期。

(4)人口减速增长的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就进入到一个减速增长的阶段。代替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在区域人口变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人口与各种资源逐渐向三大都市圈聚集,甚至在北京等一线城市出现了人口极化现象。

(二)成因

1. 集聚效益

城市化本身不仅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且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们由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第一产业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第二与第三产业转移,不仅使得全社会生产率因此而提高,而且使得城市的公共产品得以更充分的使用。世界银行研究认为,近 30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约有 10% 可以归因于城市化的进程。有专家测算,我国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每增加 1 人,GDP 总量平均增加 2. 34 万元,近 10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对 GDP 的贡献率在 15% 以上(吴冕,2011)。

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可以创造更大的集聚经济效益,因而大城市化是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人口集聚也是大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即使纽约、东京等世界超级城市,目前仍是全球主要的人口集中迁入地,其人口规模仍呈增长趋势,我国城市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王桂新,2011)。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走的是权力主导或政府推动型的“赶超战略”,以权力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房亚明,2011),使得中国的大城市化更为迅猛。

2. 理性选择

城乡与区域发展存在差异,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资源富集,就业机会多、发展前景好、收入高、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等,人们在比较利益驱使下,向城市、大城市迁徙成为其理性选择。在中国,由于政治权力在参与甚至左右资源的分配,从而使得北京等超级城市享有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优势与特权,结果出现了人口黑洞现象:人口一旦进入北京等超级城市,很少有人再愿意离开。

二、城市病及其产生根源

(一)城市病及其表征

“城市病”是指人口过度向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病”。在中国表现出

如下特征: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困失业、住房紧张、健康危害、城市灾害、安全弱化等。城市病主要发生在大城市,是人口大量聚集后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现象。因此,城市病有时也可以称之为大城市病。城市病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人口高度集聚与膨胀的结果,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由此可见,人口集聚与城市化,是一体两面,同时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功能。

(二)产生根源

学界从人口流动、城市规划、政府职能、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管理及决策者影响等方面探析"城市病"根源,并可归结为"硬件"不完善和"软件"的漏洞。也有研究认为,尽管中国"城市病"形成原因复杂,但主要由六大因素造成:一是人口过快、过多地单向聚集;二是优质资源过度集中;三是城市规划的合理性以及规划的非刚性执行导致的定位混乱;四是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与扩张速度不匹配;五是产业布局缺乏科学性,钢铁、汽车等产业发展偏离了城市功能,强化了产业性,削弱了生活性(吴冕,2011);六是城市管理与国民素质均有待大幅度提高。

城市化意味着人口更多集聚、生产和消费更集中、更大规模、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病,是人口与资源大量积聚后的必然结果,因而具有客观必然性。而在中国,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同方向叠加,使得大城市优势更为突出,对民众的吸引力更大,与此同时,也使得中国的城市病比西方国家可能更为严重。

除此之外,以往在对中国城市病的研究中可能忽视了两点:一是欲望膨胀与忍耐力下降。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欲望被刺激而迅速膨胀,忍耐力却大大下降。例如,伴随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与地铁等快速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兴建与投入使用,人们的交通出行较以往方便与快捷得多。例如,从北京工业大学到北京大学乘坐公共交通所花费的时间较以往大大缩短,但在欲望膨胀下人们还想更快,自然会出现更多的抱怨。二是"快"的代价。英国城市化水平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时间,中国从28%提高到45%只用了15年,且以每年提高1%的速度递增,至2010年已经达到50%。由此可见,中国只用了英国1/2时间、法国和美国差不多1/3时间,就走过了同样的城市化进程,具有"浓缩发展"的特征。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也使得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城市病"集中爆发(陈哲,刘学敏,2012)。中国人什么都追求快,"超常规发展"就是其最好的写照。发展中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时间去思考去解决。但由于发展太快,灵魂赶不上脚步,对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来不及深思,更来不及化解,结果导致各种问题逐步积累,因而"快"与问题往往紧密相连。因此,适度放慢前行的步伐,让灵魂跟上脚步,对中国未必全是坏事。

(三)中外案例

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东京1970年发生了光化学烟雾事件,2万人患上了红眼病。1952年英国伦敦冬季取暖燃煤和工业排放的烟雾造成了"烟雾事件",短短4天时间内4000多人失去了生命。由于有了这些血的代价,人们才认识到必须从环境角度看待一些城市化措施和工业化进程,有效阻止污染项目进入城市,才能确保环境质量。伦敦"烟雾事件"后开始下大力气治理污染,在周边建立绿色隔离带,将大批污染企业迁出伦敦,"雾都"才终于拨云见日(吴冕,2011)。

中国部分城市已患上严重"城市病"。中国城市病的出现是市场因素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首都"变成"首堵"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北京把首钢迁出,才缓解了空气质量恶化的趋势(吴冕,2011)。

三、几点思考

(一)问题制造 VS 问题化解:大城市的双面性?

在城市化过程中不仅会制造问题,而且能解决问题。显然,大城市在解决某些问题上的优势更为明

显。如果没有大城市,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正是因为城市化与城市的发展,使得人口趋于集中,规模效应得以发挥,才使得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包括环境治理在内的某些社会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因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才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

当然,人口集聚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但相对于优点,缺点与问题都是次要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城市病,就采取极端的阻碍城市发展的歧视性政策,将农村与其他城市的人挡在城市大门之外,这将导致更多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况且,中国目前所遭遇的城市病与我们以往所采取的不当社会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如鼓励城市私家车的发展)。当然,我们不应忽视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模式、完善城市建设规划、改善城市管理等去加以化解。

(二)城市病 VS 农村病:跷跷板?

有城市病,自然就有农村病。农村病的部分特征与城市病正好相反,如城市病是人气过旺,而农村病则是人气不足。城市化连接着城市与农村,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缠绕在一起,城市病与农村病在某些情况下存在跷跷板效应。对城市病的治理如果失当,将严重损及农村人的利益,使得农村病更为严重。

实际上,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中国农业人口众多,人均耕地甚少,这是“三农”问题的源头所在。通过城市化道路,大量分流和减少农民,提高农业劳动者对土地的占有数量和城乡劳动生产率(中国经济周刊,2013),才可能使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条件改善,现代化也才有可能实现。

因此,在城市病的治理过程中,我们是仅仅考虑城市人的利益,而忽视甚至牺牲农村人的利益?还是应该把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利益与诉求纳入进来一并考虑?不同的出发点所导出的社会经济政策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会导致排斥性社会经济政策的出台,并为维持一个不合理的城乡隔离性制度提供理由,而后者有利于城乡的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融合。以往受既得利益者的驱使,拒绝农民进城的观点与政策措施都是极端错误的。为解决好“三农”发展和内需不振问题,就必须坚决做到城市化以分流和减少农民为宗旨,把农民变市民作为城市化的指标和目的(中国经济周刊,2013)。

(三)接纳 VS 驱离:城市究竟如何治理?

有病治病,无病防病。城市病也是病,自然得治。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究竟如何治理,对外来者是驱离还是接纳,将决定城市的未来。

1. 城市活力与城市秩序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原住民多因生活安逸而懒惰,移民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压力而多勤劳,富有创造精神,对未来充满期许,心中有梦想,现实有行动。移民基本上包揽了城市的“脏、苦、累、薪酬低”的活,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祉与城市竞争力。因此,移民才是一座城市的活力所在与希望所在。由移民支撑的城市终将繁荣,而缺少移民支撑的城市难免衰败。

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外来人口,虽然在城里处于社会中下层,但其处境一般仍然明显比在原籍地时要好。同时他们在城里立足未稳,处于创业状态,更需要社会安定并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因而多是现存秩序的维护者(秦晖,2003)。

开放的体制不仅有利于边缘群体融入城市社会,能够以民主、法制、人权的原则维持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间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平等,有利于在市场准入基础上提供相对平等的机会。而且这种体制还有利于在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未能融合之前形成有利于化解矛盾的缓冲机制。因此,开放的体制与流动着的社会不仅不淤积矛盾,很多问题还会在流动中得以化解(秦晖,2003;陈友华,2010)。

2. 棚户区改造与居住者利益维护

如果进城移民无地可落,或因为城市整治变成无家可归者,中国将会怎样?在棚户区改造时,不仅要考虑棚户区业主的利益,更要考虑棚户区租户的利益。棚户区改造后,这些本地与外来贫民究竟能到哪里去?生活将会怎样?中国的棚户区改造,从未考虑棚户区租户的利益,可能使得外来人口与城市贫

民流离失所,进而诱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

3. 刻意回避城市病及其后果

城市病是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按下葫芦浮起瓢,刻意回避城市病,会诱发一些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出现。目前,以社会治理之名,驱赶贫民的基本做法有二:一是继续推行排斥性社会经济政策。例如,对外地人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歧视无处不在。二是对城市进行强制性改造。例如,以城市治理之名而强制拆除菜市场,使得部分外来者失去了赖以谋生的饭碗。又如,强制拆除农民工子弟学校。虽说进城民工子女可在流入地就学,但设置了许多门槛很高的前置条件,仅有少数农民工子女符合流入地入学条件。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拆除,使多数农民工子女陷入在流入地无学可上的窘境。通过这些手段,迫使外来人口返家或寻求其他可收留之地。这必然导致社会的撕裂,降低对国家与社会的认同,并诱发更多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严重威胁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四)文明 VS 野蛮:人性的光辉与人性的贪婪?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每到一座城市,人们总是喜欢看富人生活如何好,哪些地方漂亮等,而这座城市社会底层的人生活得怎样,又有多少人去关心与帮助他们?实际上,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富人生活如何好,更体现在社会底层民众生活如何坏,因为文明程度由木桶的短板决定。“好面子”使得多少人的利益与权益受到了损害。

城市是生活其中的所有人建设的,但建成后拥有城市身份者却不想与他人分享。如果城市不聚集这么多人,城市能扩张这么大吗?能有今天如此实力建设众多公共设施吗?建成后因使用者少而要求承担更多运营成本时,城里人愿意吗?等等,建设靠他人,建成后想自己独享,既要享有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好处,又要避免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坏处,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吗?这是否折射出城里人太过贪婪?中国的大城市表现出的不是包容与接纳,而是更多的排斥。

改变目前资源配置方式,是化解城市病的根本性举措。但这在消解城市病的同时,城市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减弱。北京充满机遇,自然会吸引大量的人口向北京聚集,城市病也就在情理之中。中国的城市病难以依靠地方政府解决。在城市病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与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公平合理地去配置公共资源,促进城乡与区域的均衡发展。

四、结　语

城市化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更集中、更大规模、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城市病是所有国家迈入现代化门槛不可逾越的难题(谢志强、梁洪波,1991)。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特殊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了中国的北京等超大城市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病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城市化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些是早期容易出现的,但经过治理,是可以加以改善甚至逐渐消除的,还有一些是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下降所带来的。城市化在给人们生产生活等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认城市化的积极意义与功能,并继续推行有违社会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

大城市往往具有比中小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大的市场、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集聚功能和高度的竞争性、流动性、扩张性(吴冕,2011)。但大城市不仅会出现城市病,而且比中小城市更为严重。由此可见,人们在获得某些东西的同时,也将失去某些东西。因此,在享受大城市带给人类种种好处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某些损失或者煎熬。城市病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刻意回避与硬性消除可能会使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城市不仅是属于现在的城市人,也属于未来的城市人,同时还属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城市不是让部分人的生活更美好,而是力争让所有人的生活更美好!

参考文献:

[1] 陈友华:《迁徙自由、城市化与贫民窟》,《江苏社会科学》2010 年第 3 期。
[2] 陈哲、刘学敏:《"城市病"研究进展和评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
[3] 房亚明:《城市病、贫富分化与集权制的限度:资源分布格局的政治之维》,《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 年第 4 期。
[4] 李莎、刘卫东:《俄罗斯人口分布及其空间格局演化》,《经济地理》2014 年第 2 期。
[5] 陆军:《当代德国人口困境与调控政策的修治导向》,《欧洲研究》2009 年第 6 期。
[6] 秦晖:《使"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探索与争鸣》2003 年第 5 期。
[7] 王桂新:《中国"大城市病"预防及其治理》,《南京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2 期。
[8] 吴冕:《大城市:拿什么拯救你? ——问诊中国"大城市病"》,《生态经济》2011 年第 6 期。
[9] 谢志强、梁洪波:《城市病》,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10] 中国经济周刊:《国务院参事:户籍制度是收入差距拉大根子》,2013 年 3 月 5 日。

Ration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City Disease

Chen Youhua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ing process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is a process in which human rationality is growing. The trend that small cities grow up into great cities or metropolises seems inevitable. City diseases thus can present significant obstacles that almost all countries have to deal with.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directed to the desired expansion, the decreased endurance and "the price of high speed". Urbanization can also solve problems. The appropriate governance of city diseases can solve rural diseases.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city diseases can be a reflection of human nature.

Key words: rationalization, urbanization, city disease

(本栏责任编辑　管　琴)